

從高峰到谷底——也談張資平

另眼看作家之四

文字工作者 ◎ 蔡登山

他曾經是中國新文學重要社團——創造社的發起人之一；他的《沖積期化石》更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第一部長篇小說。他一生創作過二十四部長篇小說，七部短篇小說集，還有數種譯著。在二、三〇年代，他作為名噪一時的新海派文人的始作俑者，曾引領風騷、走紅於社會；他的戀愛小說曾贏得廣大的年輕讀者的喜好。但好景不常，他終於經不起商業文化的巨大誘惑，而被滾滾紅塵無情地吞沒了。他的作品在遭到由黎烈文主編的《申報·自由談》的「腰斬」後，也顯得一蹶不振。他就是張資平。

說到黎烈文，他 1904 年生於湖南湘潭，初中畢業後，來到上海。考取商務印書館編輯所書記員，擔任謄抄、整理和校對文稿的工作。後來升任助理編輯，他的短篇小說集《舟中》和整理標點的《大唐三藏取經詩話》等古籍，就是這一時期初露鋒芒的實績。1926 年黎烈文東渡日本求學，在短短的十個月中，他利用課餘時間譯出一部芥川龍之介的短篇小說集《河童》。翌年回國，不久由上海啟程赴法留學。1928 年初，他考入法國地城（Dijon）大學。兩年後畢業又進入巴黎大學攻讀碩士學位，1932 年春，學成歸國。由於巴黎大學老師的推薦，法國「哈瓦斯通訊社」上海分社，在黎烈文回到上海後的第二天，就聘他擔任翻譯工作，工作之餘他還著手翻譯梅里美、賴納、莫泊桑的小說。不久，他應《申報》總經理史量才之聘，從 1932 年 12 月 1 日接編該報副刊〈自由談〉。在這之前，〈自由談〉先後經王鈍根、吳覺迷、姚鵬雛、陳蝶仙、周瘦鵑等人主編，可說是鴛鴦蝴蝶派所編的文學副刊。黎烈文接編後，銳意革新，擬把它變為新文學的陣地。

黎烈文與張資平素不相識，他只知道張資平是創造社的元老，他的小說極為暢銷。當時張資平已出版的長篇小說有：《沖積期化石》、《飛絮》、《苔莉》、《最後的幸福》、《石榴花》、《青春》（又名《黑戀》）、《長途》、《愛力圈外》、《糜爛》、《跳躍的人們》（又名：《紫雲》及《戀愛錯綜》）、《愛之渦流》、《天孫之女》、《紅霧》、《明珠與黑炭》（又名：《青春的悲哀》）、《歡喜陀與馬桶》、《上帝的兒女們》、《群星亂飛》、《北極圈裡的王國》等十八部；短篇小說集則有：《愛之焦點》、《雪的除夕》、《不平衡的偶力》、《植樹節》、《寇拉梭》（又名：《梅嶺之春》）、《素描種種》、《戀愛花》等七部，稱得上是多產的暢銷作家。黎烈文透過郁達夫介紹，在 1932 年 11 月宴請作家時，也邀請了張資平，並請他為〈自由談〉寫連載小說，於是從同年 12 月 1 日起，張資平的長篇小說《時代與愛的歧路》就開始連載了。



《時代與愛的歧路》仍是一部典型的張資平風格的愛情小說。它出現在〈自由談〉上，是顯得有些不倫不類的。因為一面是進步作家的嚴肅文章，一面卻是通俗性的新言情小說，自然引起一些讀者的不滿。於是到了次年4月22日〈自由談〉編輯室刊出啓事說：「本刊登載張資平先生之長篇創作《時代與愛的歧路》業已數月，近來時接讀者來信，表示倦意。本刊為尊重讀者意見起見，自明日起將《時代與愛的歧路》停止刊載。」這樁「腰斬」事件，在當時上海的小報間曾引起大肆渲染。其中《晶報》在4月27日就載有〈自由談腰斬張資平〉的短文。而甫創刊不久的《社會新聞》，更在第三卷十三期（5月9日出版）刊登了「粹公」所寫的〈張資平擠出《自由談》〉一文，其中有「今日的〈自由談〉，是一塊有為而為的地盤，是『烏鴉』（案：指曹聚仁等）、『阿Q』（案：指魯迅）的播音台，當然用不著『三角四角戀愛』的張資平混跡其間，以致不得清一。」又說：「在張資平被擠出〈自由談〉之後，以常情論，誰都咽不下這口冷水，不過張資平的鬪懦是著名的，他為了老婆小孩之故，是不能同他們鬥爭，而且也不敢同他們擺好了陣營的集團去鬥爭，於是，僅僅在《中華日報》的〈小貢獻〉上，發了一條軟弱無力的冷箭，以作遮羞。」

同年6月初，曾被魯迅譏諷、指斥過的作家曾今可，會同張資平、胡懷琛等受過魯迅嘲笑的文人，聯絡了黎錦明、傅彥長、張鳳、龍榆生等一些文化界朋友，組成一個文藝漫談會。並於7月1日出版《文藝座談》半月刊第一期，其中刊登白羽遐的〈內山書店小坐記〉，誣陷內山完造是日本偵探，並以此攻擊魯迅。5日《申報·自由談》發表谷春帆的〈談「文人無行」〉，文章斥責曾今可和張資平，在指責張資平時說：「他最近也會在一些小報上潑辣叫噪，完全一副滿懷毒恨的『棄婦』臉孔」。他認為白羽遐就是張資平的化名，因此說：「他陰謀中傷，造謠挑撥，他會硬派人像布哈林或列寧，簡直要置你於死地，其人格之卑污、手段之惡辣，可說是空前絕後。」，於是次日張資平在《時事新報》刊登啓事，除聲明自己不會化名白羽遐之外，並在文中攻擊黎烈文，指其以資本家為後援，憑「姊妹嫁給大商人為妾，以謀得一編輯以自豪」。隔天，黎烈文在《時事新報》亦刊登啓事，斥責張資平之污蔑，並說：「烈文只胞妹兩人，長應元未嫁早死，次友元現在長沙某校讀書，亦未嫁人，均未出過湖南一步。且據烈文所知，湘潭黎氏同族姊妹中不論親疏遠近，既無一人嫁人為妾，亦無一人得與『大商人』結婚，張某之言，或係一種由衷的遺憾（沒有姊妹嫁作大商人為妾的遺憾），或另有所指，或係一種病的發作，有如瘋犬之狂吠，則非烈文所知耳」。於是面對黎烈文的反駁，有的記者就專程到張資平在上海真茹的「望歲小農居」寓所去問個究竟。張資平只好抵賴，說「為妾」一事是另指他人，但這個人的名字不能公開。（而十多年後，張資平再次和朋友沈立行提及此事時，則坦言承認：「作妻作妾，只是傳來之言，今天看來，我是作得太損太絕了！」）7月8日，魯迅致函黎烈文，指斥張資平「造謠生事，害人賣友」，把張氏的戰法類比為鄉下「下劣無賴」的潑皮戰法。而張資平則在七月號的《朔望》半月刊發表打油詩〈遊歐歸客感賦〉攻擊黎烈文，並順帶諷刺魯迅和「左聯」。被腰斬的《時代與愛的歧路》，張資平還是把它寫完了，於同年11月由上海公眾書店出單行本，並於1936年12月改名為《青年的愛》再版。在續寫的

內容中，張資平藉著小說人物的口，大肆影射與辱罵魯迅，通過小說人物的話語宣洩了他的私怨。

歷經「腰斬」事件後，張資平元氣大傷，文學創作亦急遽滑落。當時，年輕的批評家李長之就說過，社會慷慨地把張資平捧上了名利的高峰，卻又無情地將他拋向輕蔑的低谷（注1）。而學者顏敏也指出，張資平沒有跟上時代的轉型，沒有實現話語的轉換，他越是滑向民間敘述，越是走向窮途末路。從文學創作看，張資平的小說跳不出多角戀愛的窠臼，也聽不進文壇諍友的規勸，不斷重複地複製同樣的題材，而且粗製濫造（注2）。在他續完《時代與愛的歧路》後，在次年9月又出版《愛的交流》長篇小說。但此時他的小說已不再暢銷，他自己開的「樂群書店」也關門大吉。有的書商把他名字中的「資」挖去，又把書名改掉，成了「張平」著的另一本小說，但有時仍被讀者識出而拒買。而原先由張靜廬、洪雪帆主持的「上海現代書局」和張資平簽訂多項計畫，包括出版三卷本的《資平小說集》和十餘種日本戀愛小說的譯著，也只出了三卷本的《資平小說集》後就宣告取消計畫。從1935年到抗戰爆發前的兩年中，張資平除了重印兩本短篇小說集：《張資平選集》及《張資平小說選》外，只有一本譯作《人獸之間》問世。

就在他人生處於逆境的時候，擔任「商務印書館」總經理的王雲五向他伸出援手，聘他擔任地質、岩礦學的編輯。而原本畢業於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理學院地質系的張資平，又回到他的專業。他埋首編輯自然科學的著作，倒也做出了一些成就。這期間，他先後為王雲五主編的《自然科學小叢書》寫了《蓋基傳》，翻譯了《結晶體》、《礦物與岩石》、《岩礦化學》、《世界地體構造》、《民族生物學》、《化石人類學》，編著了《外國地理》、《地圖學及地圖繪製法》，翻譯了《中國地史》和《人類住域之地理的研究》等書。

1937年8月上海抗戰開啓，位於閘北的「商務印書館」編譯所被炸，張資平只能蝸居真茹躲避戰火。次年3月，梁鴻志等人籌建南京維新政府，雖然當時張資平已漸漸退出文壇，但畢竟還算個文化名流，可資利用。於是他們對張資平採取軟硬兼施的手段，一方面派人前往張家遊說勸誘，一方面又派日本憲兵特務去質詢張資平小說中的「排日傾向」。張資平見勢不妙，潛逃至香港，後又轉往梧州，出任廣西大學礦冶系主任。同年10月，廣西大學遭到轟炸，學校由梧州遷往桂林。張資平向學校請假一個月，據他說是想繞道越南回上海接家眷，但事實上可能是他無法放棄上海的豐裕生活，而根本不願獨身輾轉於偏僻的西南地區。而就在他經越南到達香港時，他接受日本駐香港總領事村豐一的招待和路費。次年5月，他再度接受日方的資助，化名張聲，先後創辦《新科學》和《文學研究》雜誌，則已初步陷入漢奸的泥淖中。9月，他化名張星海，參加以日本駐滬副領事岩井英一為顧問，以化名嚴軍光的袁殊為主任幹事的「興亞建國運動本部」，任該組織的文化委員會主席。次年3月，出任汪偽南京政府農礦部簡任技正。曾是昔日好友的郁達夫看不過去，於是在新加坡的《星洲日報·晨星》上發表〈文人〉一文，嚴厲譴責張資平的投敵附逆。

就在擔任偽職期間，他傳出外遇。據後來擔任《大眾夜報》副刊編輯沈立行說：「偽農礦



部技術司有個女科員劉敏君，年方二十四歲，長得非常俊俏。她喜愛文藝，也常在報紙副刊上寫點豆腐乾文章。她知道張資平是個大文學家，就十分崇拜，頻獻殷勤。當時，張資平四十八歲，年齡雖是劉小姐的一倍，但西裝筆挺，一表人才。劉敏君爲了要寫作，就經常和張混在一起。張資平連哄帶騙，終於勾搭成姦。劉敏君因非常漂亮，在偽農礦部的綽號就叫『小花瓶』。本來這是一件平常的小事，但當時南京有張小報《京報》，刊出了連載《小花瓶傳奇》，將張、劉的戀愛而至姦居，添油加醋，大加宣傳，一時傳遍滬寧，『小花瓶』就此出了名。張資平十分喜愛『小花瓶』，就在南京租了一所小套房，肉麻地取名爲『瓶齋』。……『小花瓶』的豔史傳出後，張資平甚爲惱火，曾在漢奸雜誌《中日文化》上寫了長篇小說《折柳》，竭力辯說這是正常的戀愛。後來，張索性寫了一本長篇小說《新紅A字》，說什麼『有人想以暴力來制裁我們的結合。』這是張資平寫的最後一部長篇小說，給他不光彩的『△』文藝，劃上了句號（注3）。」

抗戰勝利後，聲名狼籍的張資平在1946年秋，經由朋友的引薦找了沈立行，於是在《大眾夜報》上刊出〈胎動期的創造社〉及〈《創造季刊》時代〉兩篇回憶錄，由於文章披露了一些鮮爲人知的文壇史實，而且文筆流暢，果然增加了報紙的銷路，但同時報社也不斷收到讀者的來信，認爲不該刊登漢奸的文章。於是張資平就化名爲「秉聲」，寫了長篇歷史小說《繞弦風雨》，連載三個月後，報社也不得不喊停。

1948年3月20日，國民黨上海市黨部以漢奸罪名，對張資平提出公訴。同天，張資平寫信向當時在北京大學當校長的胡適求援，隨信又附上〈我之辨明〉一文，對自己擔任偽職一事，百般抵賴。並在辨明書中說，國民黨上海市黨部主任方治，是受部下姚中仁蒙蔽，不加細查而追究他的；而姚中仁則是因侵佔他上海江蘇路住房未果而洩憤的。信寄出之後，同天張資平又追寄一封，信中說：「希望先生代陳之主席，並商之陳立夫先生，設法消弭弟案於無形。若能更進而爲之解決多年失業之痛苦，俾得追隨左右，尤深感激。若先生以爲不能援手，亦望加以公平之批判，公之輿論，以待社會之公判也（注4）。」胡適沒有給他回信，在民族大義下，更不可能爲他辯解。4月，張資平被法院判處有期徒刑一年三個月，他不服提出上訴。8月，國民黨上海高等法院更審後，維持原判。張資平聲稱要向最高法院上訴。1949年1月，最高法院特種刑事庭裁決，撤銷張資平一案，發還上海高等法院更爲審理。此案，後來就不了了之了。

1949年5月上海解放。6月，張資平兩次上書上海市副市長潘漢年，請求分配工作。潘漢年批復給長寧區人民政府處理，準備讓他去中學任教，但張資平不願接受。他又上書郭沫若，請求援引。郭沫若向有關部門提議，在政策許可的範圍內，給予安排。1950年初，東北人民政府來上海招聘教授，張資平以張聲的名字報考，結果被錄取，但後來發覺他的真實身份後，又遭解聘。

張資平在生活困難之下，只得寫稿度日。據沈立行說，他曾在《亦報》會客室內見過張資平，衣衫襤褸，又黑又瘦。仍以「秉聲」爲筆名，寫連載小說《曾剃頭》（曾國藩）。而周作人也在《亦報》寫專欄，「北周南張」兩個文化漢奸，擠在一個版面上了（注5）。當時周作人是

應主編唐大郎之邀，自1949年11月22日至1952年3月15日，以筆名申壽、鶴生、十山、祝由，發表短文約九百零八篇。（注6）

1952年張資平給周恩來總理寫信，請求分配工作。6月他遵照指示，去長寧區失業知識份子委員會，交代了自己的過往，並進行登記。他被准許參加上海新教育學院的第八期考試，筆試通過後，卻因患嚴重的高血壓而作罷。後來身體稍好，就直接寫信給劉少奇主席。當時的政務院給了回信，要他編譯礦藏冶煉方面的書籍，批交「商務印書館」負責出版，總算稍稍得以餬口。1955年「肅反」運動開始，張資平以反革命罪被逮捕，不久與妻子離異。1958年9月被上海中級人民法院判處有期徒刑20年，主要罪名是漢奸罪。次年12月2日，在隆冬的寒風中病逝於安徽白茅嶺勞改農場，死時六十六歲。曾是兒女成群的他，最後卻是孤獨一人，後事只得由政府料理（注7）。

學者曾華鵬與范伯群在〈論張資平的小說〉（注8）文中指出，張資平早期的創作，無論是抗議封建婚姻制度，或是對不幸者寄予同情，都顯示張資平是意識到作家的社會職責的，他的創作與創造社同伴的步調也基本一致。但是到了後期，他成為「樂群書店」的老闆，金錢就成為他創作的指揮棒，他所從事的就是以賺錢為目標的商業性寫作了。尤其在兩篇貼上「性」的標籤的短篇小說——《性的等分線》、《性的屈服者》之後，肉慾遊戲的描寫已在作品裡開始氾濫。到後來更是變本加厲，越演越烈，甚至完全墮入專寫人的性慾本能的泥淖中。題材的不堪，加上大量生產、粗製濫造，終於導致他的徹底失敗。同樣的，在他的人生道路上，他放棄知識份子的使命，陷入了政治的泥淖中；他由高峰跌入谷底，晚景不可不謂淒涼。

注釋

注（1）：李長之〈張資平戀愛小說的考察——「最後的幸福」之新評價〉，載《清華週刊》第41卷，1933年。

注（2）：顏敏《在金錢與政治的漩渦中：張資平評傳》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，1999年。

注（3）（5）：沈立行〈我所認識的「三角戀」作家張資平〉，《檔案與史學》，1997年1月號。

注（4）：《胡適來往書信選》（下），中國社科院近代史中華民國史組編，中華書局，1979年。

注（6）：根據《周作人年譜》的統計。張菊香、張鐵榮編，天津人民出版社，2000年。

注（7）：顏敏《在金錢與政治的漩渦中：張資平評傳》，附〈張資平年表〉。

注（8）：曾華鵬、范伯群〈論張資平的小說〉，《文學評論》，1996年第5期。